

刘心武文存40

[1958—2010]

自述卷

我是刘心武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
72
V40

013031963

刘心武文存40

[1958-2010]

自述卷

我是刘心武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
72
V40



北航 C1639111

▲江苏人民出版社

0081806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刘心武 / 刘心武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(刘心武文存; 40. 自述卷)

ISBN 978-7-214-08509-2

I. ①我 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刘心武—回忆录 IV.
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2288号

书名	我是刘心武
著者	刘心武
责任编辑	刘焱
统筹编辑	李丹
特约编辑	朱鸿
文字校对	陈晓丹 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张	23.25
字数	384千字
彩插	4
版次	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8509-2
定价	6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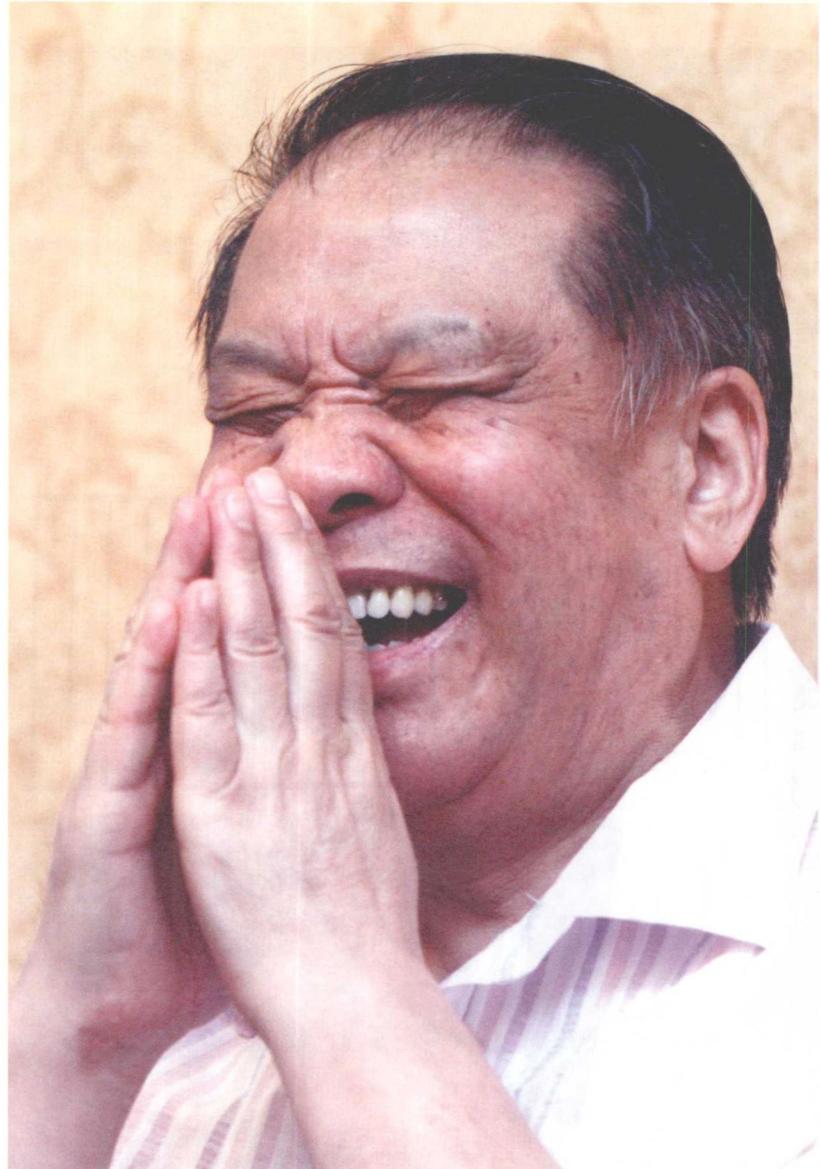
▲ 好奇（1947的刘心武）



▲ 1972 年刘心武一家



▲ 在诞生地成都育婴堂街留影（2006年）



▲ 大笑（2007 年的刘心武）

《刘心武文存》出版说明

《刘心武文存》收录刘心武自1958年16岁至2010年68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900万字。《文存》共40卷，按文章门类收录，计有长篇小说5卷、中篇小说4卷、短篇小说5卷、小小说1卷、儿童文学1卷、建筑评论2卷、《红楼梦》研究4卷、散文随笔11卷、杂文1卷、海外游记1卷、多品种（图文交融文本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剧本、足球评论、译述）1卷、创作谈1卷、理论批评1卷、早期（1958年至1976年）作品1卷、自述1卷。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，收录定有遗漏，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，相信均已收入。

《刘心武文存》各卷均附有《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》及《刘心武著作书目》，可备检索。

编辑出版《刘心武文存》的目的，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

自序：是的，这就是我

估计愿意看这本书的，主要是两种人。

一种是早就知道了我的。多半是在 1978 年前后，读了我的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等作品后，就一路追踪阅读我那以后的作品：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、纪实小说《5·19 长镜头》……但是，进入上世纪最后十年，我的生活和写作都边缘化了，这些读者随着年龄增长，也都遇到了人生当中许多的关坎儿，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文学作品，我后来又写了些什么，生活得怎么样，他们就不大清楚了。但是，2005 年，我忽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《百家讲坛》，连续讲了 23 讲《揭秘〈红楼梦〉》，跟着又出了两本共 36 讲的书，引出了不亚于当年《班主任》那样的社会性轰动，有人甚至认为比那时候还更热闹。我的这些老读友或兴奋，或惊讶，因此，他们或者就想了解：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来的？

另一种是非常年轻的一代。我发表《班主任》，甚至因《钟鼓楼》获得茅盾文学奖，以及担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的时候，他们或者根本还没诞生，或者还是没上小学的幼童。他们上到中学，或刚考进大学，对早已边缘化的我，完全不知道，或者只是模模糊糊有点印象，也是因为《揭秘〈红楼梦〉》，我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这人是谁呀？什么？以前写过《班主任》，还有《钟鼓楼》？哪儿能找到这些古董？他们开始有了对我揭秘的兴趣。

那么，这本书，就主要是奉献给这些读者的。

这还不是一本自传。我还没到 70 岁，也许过了 70 岁我会静下心来写一部“从

头说起”的自传。但这本由许多篇不是一个时间段里写成的文章组成的书，确实又有自传性因素。

这也还不是一本回忆录，回忆录跟自传是两种文体。自传是把自己的一生展现出来，回忆录可以不去完整地交代自己的生平，而把重点放在写出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变迁、所见所闻，往往会较多地写到别人别事。那么，这本书却也具有一定回忆录的因素。

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？我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值得一说的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思？

总之，这就是我。我面对大家，有些羞涩，却也坦然。

我的命运一贯如此：还真有喜欢我的，总在关注、支持、鞭策我，这些人士对我的理解、谅解、指正、宽容、善意、爱护，是我生命赖以存活、前行的宝贵动力。我对他们总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激之情，我希望通过这本书，能跟他们更加亲近。也真有讨厌我的，以至讨厌到咬牙切齿的地步。这本书当然首先是奉献给喜欢我的人士，但如果有讨厌我的人士愿意翻翻，我会高兴。因为，我总觉得，讨厌我的人士里，其中有一些恐怕是对我还缺乏全面的了解。如果读了这些文字，能多少增进些对我的了解，减轻些因讨厌我而生发出的痛苦烦恼，那么，对我来说是大福气，对他们来说岂不也有利身心健康？当然，无论如何还是要讨厌我的人，总会存在，那么，我祝他们幸福，祝他们能在所喜欢的人士那里，获得快乐。毕竟，人活着应该把更多的情感赋予喜欢，而不是讨厌。爱比恨，肯定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生命的良性运转。

感谢出版社，他们对我所提供的素材，进行了细心的编辑，才形成了这样一本书。

2006年7月8日绿叶居

目
录

自序：是的，这就是我 · 001	我的元记忆 · 066
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· 001	童年：火的记忆 · 069
祖父、父亲和我——挣不脱的链环 · 007	小颗粒 · 074
炸出一个我 · 012	硬木棍 · 078
父亲脊背上的痱子 · 019	瓜菜代·小球藻 · 082
能够善良 · 023	我是一个“新北京” · 087
免费午餐 · 025	哄堂大笑中的领悟 · 091
远去了，母亲放飞的手 · 029	白石的乳汁 · 095
神圣的沉静 · 041	面对二十岁 · 100
美丽的藩篱 · 043	恐 怖 · 104
归来时，已万家灯火矣 · 046	少年的心，天上的云 · 108
隆福寺的回忆 · 051	从“豆腐块”开始 · 116
楸树花 · 059	我为什么写作 · 119
跟陌生人说话 · 062	我的处女作 · 121

我的写作导师 · 124	我看《金瓶梅》 · 209
关于《班主任》的回忆 · 127	感念茅盾 · 214
风正一帆悬 · 133	我与古典文学 · 217
人生不能缺此情 · 139	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 · 222
姐弟读书乐 · 142	我是怎样一个瓶子 · 229
妻子晓歌 · 144	我的鼻子 · 233
与妻子重游北海 · 147	我的功夫 · 235
看儿子慢慢长大 · 149	我爱看旧照片 · 238
五十自戒 · 153	我有一段软心肠 · 246
我的平民朋友 · 157	我的读书习惯 · 248
惜别老罗 · 162	狼 · 蟒 · 牛 · 猫 · 250
我爱夜凝珠 · 166	只求随缘而处 · 253
我的生命消费方式 · 169	羞 涩 · 256
消化自卑 · 171	一件亏心事 · 259
不应忘记的人 · 176	有时何妨保守 · 264
凌乱一点才是家 · 181	走进私人空间 · 269
我的“绿宝石” · 184	渴望平静 · 273
这里叶子常绿 · 186	
90年代的“边缘生活” · 189	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· 275
《红楼梦》系列讲座的自白 · 193	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· 284
附：关于《红楼梦》的问答 · 197	附录三 刘心武文存总目 · 305

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

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。母亲生我前，已有三子一女，最小的女儿已经八岁。当时家庭生活困窘，母亲不想再添累赘，便遍求偏方，想在孕中把我打掉，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，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。

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。父亲出于爱国热情，给我取名“心武”。“心”是排行，“武”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。

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。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，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。我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，尽管后来我不止一次回过安岳县城，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。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，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，有着一面用四排二十四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，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，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，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。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，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，既已储留心中，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。

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。我们住在南岸，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。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，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，对岸是密密麻麻的“吊脚楼”，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，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……晴天很少，雾气常来，到了晚上，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，使我感到无比神秘。

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。

1950年，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，我们全家随往。从此，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。

刚到北京，我是一个顽固的“小川佬”。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，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。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，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，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，弄得老师皱眉、同学取笑。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，那老师气恼之下，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，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。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。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。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：“干吗？！”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以说北京话。

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，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。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、改造，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。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。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，最令我难忘的业绩，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，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。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，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，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，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，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。从那回起我就明白，在人生的途中，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，因为我太笨。

有一天下午，午睡后跑去上学，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，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。后来老师告诉大家，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，淹死了。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，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。我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音容貌。头天下午上课时，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。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。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。

后来我上了中学。我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。到了高中，我的成绩更好一些。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。刚上高一，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，我就答错了，而且错得很蠢，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.3市尺。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。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，但物

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，他教了那么多年，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，这很伤他的自尊心。他再没有提问过我，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，因为在后来我每次的测验、期考都得的是5分。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。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，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，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，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。但最后的学期总评，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。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，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，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。

当然，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。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，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，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。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。

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。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。不是没有考取，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。

一位高中同学，原来是近于崇拜我的，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，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《北京晚报》上登出文章，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，便是由我改编的；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，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，他毫不掩饰、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——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立体的看法。

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。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。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。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，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。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，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，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——我安心教学工作，备课认真，讲授生动，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。

我上学比同代人早，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我才十九岁。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，只比我的学生大四岁。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，有的现在还能

遇上，他们对我执弟子礼，使我很尴尬——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。

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正是我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的青春岁月。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、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、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，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，而且精神上很充实。我读了不少书——不仅是文学书籍，也有不少哲学、历史、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。我熟悉了不少人——不仅是学校的干部、教师和所教的学生，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，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——建筑工人、三轮车夫、电车售票员、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、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……及至于以拣废纸、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老太太。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，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。

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。学校就是那么大，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、什刹海一带。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，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，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。但就在那几年里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，还能以极够味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。例如天气闷热时，便会说：“这天哪，盖了盖儿啦！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，邪乎！”语言还在其次，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“老北京”的种种特殊心境，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，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，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，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——直到今天我写小说，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。1966年夏天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暴风雨袭来时，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。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，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。1957年“反右”时我刚上高中，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“右派”了，后来陆续不见踪影，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、开批判会，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，并不知道在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。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“反右倾”，但我连团员都不是，自然未受触及。参加工作以后，我才加入了共青团，但1964年以后搞“四清”运动，学校里虽然也

抽了一些人去参加，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确实是以“迅雷不及掩耳”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学校。我不可能是“革命造反派”，因为尽管我比那些“造反”的高中三年级“小将”大不了几岁，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。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，因为无论当“走资派”，还是当“反动权威”我都不够资格。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——因为几天之内，“造反”的“小将”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，有他们认为“该死”的“臭流氓”，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“反动资本家”，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。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，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，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。

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。我在《北京晚报》上发表的一些“豆腐块”就刊登在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旁边。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、水袖等技巧，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“放毒”的成分，于是乎出现了揭发我“反动言行”的长篇大字报。后来有一天，“群众专政小组”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，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我的全校大会，主要的罪名是“猖狂反对京剧革命”和恶毒攻击江青。

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。胃口不大好，但也还吃得下去。回到宿舍，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，自己也感到吃惊——我何以这样镇静？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，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——所谓“群专小组”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。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，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——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。

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。那敲开我的学生是一个曾使我倾注过大量同情的弱者。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“遣返回乡”，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。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，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。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“狗崽子”，不仅无资格参加“造反”，有时还要受到诟骂。我曾在他们母亲情绪最低落时，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们三个兄弟，在